

延安时期党的“四个服从”教育

□ 林 宁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首次提出党内“四个服从”的新理念，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到1945年6月，“四个服从”理念写入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这一段时期的党内教育也突出了“四个服从”内容，对统一思想，贯彻“四个服从”发挥了重要作用。

突出纪律特性，强化服从意识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了“四个服从”的两个特性。一是纪律特性，毛泽东指出“四个服从”是党的最重要的四项纪律，“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二是组织特性，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指出：“四个服从”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

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毛泽东指出：“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纪律教育相比组织原则教育更易唤起党员在思想上的重视，牢记“四个服从”，强化遵守意识。他特别强调把“四个服从”作为纪律来教育党员，“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这也为党内开展“四个服从”教育要突出纪律特性指明了方向。

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为纠正部分党员的个人主义、独立主义、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在全党加强“四个服从”纪律教育，要求全体党员严格遵守。1942年7月，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在中央党校就如何深入学习贯彻好这个《决定》作了报告，他指出：“纪律教育十分重要”“党的六中全会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毛主席报告里所提出的党内团结的重要，重申个人

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纪律”。

陈云多次在党内教育中，重申“四个服从”的纪律特性。1939年4月，在中央党校讲授关于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的提纲中指出，组织团结靠纪律，纪律的具体表现就是“四个服从”，强调“遵守纪律是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1940年3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发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讲话指出，“党的纪律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为了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统一，也是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统一”。

辨析不良倾向，批驳错误思想

1939年7月，延安马列学院邀请从华中回到延安的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给学员们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演讲通篇理论联系实际，有理有据，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赞扬这篇演讲“提倡正气，反对邪气”。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长篇演讲用了两个半天，第二个半天是专门讲“党员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的自我修养”，其中主要篇幅是讲“四个服从”的，可以说是党内“四个服从”教育的经典一课。

刘少奇开门见山就指出“四个服从”是我党最重要最基本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党同志不论党的领袖或普通党员，均须绝对的无条件的执行”。接下来通过梳理出近年来党内在执行“四个服从”原则时存在的不良倾向和党员干部的一些思想疑惑，进行透彻地辨析，澄清认识误区，有力地批驳了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

他说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一些同志在执行“四个服从”原则时以种种形式和借口提出有条件地服从。主

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政治上是否正确作为服从条件；二是以党的领导机关及领导同志在工作能力、领导能力上的强弱作为服从组织与上级的条件；三是以组织与上级党负责人在党内资格深浅及地位高低作为服从条件；四是以组织与上级负责人态度好否、有无成见、个人感情好否等作为服从组织与上级的条件。对于每个方面问题，都列出三至五条理由进行严密地分析，深刻地论理，铿锵有力地驳斥“这是不对的！”，让听者很受震动。

同时，刘少奇还指出“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就是机械论，一些同志错把不顾实际情况机械地服从当成了绝对服从。他阐释了三种不应机械服从的情况。第一种，不是不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动和新的革命斗争经验的吸收来补充、发展甚至改变党的决议与上级指示之某些个别条文、个别结论。第二种，不是说当组织与上级的负责人反对国际、中央与高级党部时仍须服从；也不是说在发现某某负责人在基本上有重大的不忠于党的事实的仍须服从。第三种，不是说对上级和组织关于每一个纯粹带着实际性质问题的指示，也不能在执行时依据情况的变化而有任何的改变。

1941年11月，返回华中工作的刘少奇还抽出时间在华中中局党校专门作了一场《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报告，使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机关、部队的党员干部普遍接受深刻的“四个服从”教育，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团结巩固。

开展案例讨论，促进对照深省

1939年5月，中央党务委员会向全党通报了一个叫刘力功的新党员讨价还价拒不服从组织分配工作而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案例。通报指出，党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对刘力功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个人服

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刘力功违犯了党的纪律，又不接受党的教育，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于全党。

“刘力功问题”是普通党员违犯“四个服从”纪律的典型案列。在通报发出后，陈云要求延安各机关、学校组织党员围绕“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党籍”专题集中开展大讨论和对照检查，借机进行一次活的“四个服从”教育。他说，党不仅在课堂上要教育党员遵守“四个服从”纪律，而且要在每个具体违犯“四个服从”纪律的问题上给予纪律的教育。

为指导推动这次案例讨论，陈云专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署名文章《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核心观点就是全党同志应对刘力功案例中接受教育：怎样才叫做真正遵守“四个服从”纪律。他说应从两个方面来评判，一方面遵守纪律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另一方面，在实际执行党的决议中是迅速确切的，而不是拖延的、敷衍的，甚至故意歪曲的。这就要求每一个党员在接受党分配工作时，只能是这样的立场：“我个人有做某种工作的愿望，但是如果党有任何别的决定，我绝对服从”。反之，刘力功搞“两面派”，曾经举过手“拥护”党的纪律，但是要他从口头上赞成到实际上执行党的决议时，就完全相反，不遵守党的纪律了，而且党组织曾经与他谈过7次话。文章的最后，陈云也表明了中央的决心，党内“决不允许那些明知故犯的不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分子存在”。

刘力功案例大讨论取得明显成效，延安机关、学校的党员纷纷对照刘力功案例检查自己是否真正遵守“四个服从”纪律，并且迅速进行整改，出现了服从组织分配工作的新气象。一些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党员，主动撤回请求。一些分配工作还未到岗的党员，立即打起背包出发。

刘志丹在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就把“追求真理，救国救民”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他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逐“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的理想，坚守“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在全中国实现”的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他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底！”

□ 屈永峰

1903年10月出身书香门第的刘志丹，自幼目睹家乡父老在反动政权和地主豪绅残酷剥削下的苦难生活，为大众鸣不平的朴素情怀油然而生。他16岁进入永宁山高等小学接触到“三民主义”思想，萌生了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1922年，他投考榆林中学，寻找改造社会的真理。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影响下，他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兴办平民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并参与校务管理，组织学生罢课运动，与黑暗势力作斗争。1923年他在《榆中旬刊》上发表的《万恶的狂风》中写道：“只管伤痛是无用的，盼望你们赶紧召集同伴，拿起百折不回的精神，与狂风飞沙相抵抗”，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诗歌《登镇北台》中，他立下了“看长城内外破碎，重收拾有待吾辈”的壮志豪言。在《爱国歌》中，他发出了“快，内惩国贼，外抗强权，救我中华万万年”的怒吼。在共进社大会的题词中，他更是发出“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怕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的雄壮呐喊。

榆林中学的求学经历和革命活动，让刘志丹从一个单纯同情劳苦大众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1924年，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转为共产党员，当即立下铮铮誓言：“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底！”他认为“虽有文事，必有武备”，经组织推荐，于当年7月奔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从此将自己的命运和中国革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要让全中国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

1927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实行反共“清党”，威逼刘志丹等共产党员“必须宣誓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之领导，守国民党之规则”，否则“查明枪决”。对此，刘志丹毫不畏惧，断然拒绝，义正词严地说：“我自从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就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随后，他机警地躲过敌人暗算，在武汉找到党组织，奉命回陕西，组织领导了震惊西北的渭华起义。在总结渭华起义失败原因时，他认为“还是要搞武装，以革命的武装战胜反革命的武装”，并提出红白灰“三色论”建军思想。1929年至1931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在陕北、甘肃、宁夏，开展兵运。虽然一系列兵变都失败了，他也是几次身陷囹圄，死里逃生，但他屡经挫折从不气馁，积极探索组建革命武装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

1934年，敌人抄了刘志丹的家，刨了他家祖坟，刘志丹安慰家人，“要干革命就难免受迫害，株连家族亲属虽然痛苦，但也在意料之中”。舅舅劝他不要再干革命，受苦受罪，还连累家人，他坚决答道：“我一个人当员外有啥用？我要让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当他的两个儿子因饥寒交迫和敌人毒害先后死去，他忍着巨大悲痛安慰妻子说：“要想开些，干革命就得舍得一切，包括亲人在内，只有站起来英勇的斗争，才能有人民的幸福和自由！”

刘志丹时刻把群众疾苦放在心上。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他指出，我们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建设，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他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经济教育，剔除封建陋习，举行民主选举，制定廉洁法规，严守群众纪律。他经常教导大家，人民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我们从一开始

『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讲节操，受冻挨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

作为西北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刘志丹从不搞特殊，穿着粗布衣，每到一处总是抢着站岗放哨、照顾伤员、碾米做饭，筹到衣物，也总是让给战士们，他的军马上经常驮的是小战士或伤病员。他这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民主作风，深受群众和战士爱戴，大家都亲切的称他为“我们的老刘”。

“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

在领导人民翻身解放的斗争中，刘志丹不仅要同敌人作英勇顽强的殊死搏斗，还要与来自党内“左”倾路线开展斗争。他受到“左”倾路线严重迫害有两次。一次是1932年12月，红二十六军二团成立后，陕西省常委杜衡兼任军、团两级政委，在党内执行“左”倾路线，诬蔑刘志丹学习井冈山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领导职务。但他为了减少伤亡，多打胜仗，忍辱负重，积极协助团长王世泰开展工作，毫无怨言。杜衡强令红军南下渭华战败后，革命陷于低谷，他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鼓励大家，“干革命一时一地失败不算什么，失败了再干嘛，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第二次是1935年10月，刘志丹率领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步胜利，“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革命队伍中进行所谓“肃反”，诬蔑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以欺骗的手段将他调离前线。当逮捕密令碰巧送到他手中时，为了不使党分裂，他让通信员继续送信，自己单枪匹马奔赴瓦窑堡，准备向上级申诉。但他一到瓦窑堡就被投入监狱，受尽折磨。在狱中，他叮嘱同志，“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出狱后，面对同志们的委屈抱怨，他安慰大家说，“过去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派遣”。

1936年2月东征前，刘志丹对妻子说：“我这次上前线，是再次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贡献出一切”“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带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未竟事业的万千遗憾，英勇牺牲！他的遗物中只有半截铅笔和几根抽了一半的香烟。



党的第一个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

□ 甘学荣

在党的建设史、工人运动史、中国法制史中，都绕不开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机构；她存在时间很短，发挥作用却很大，影响深远。这个机构，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党的一大决议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决定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然而，当时党员人数少，且当时党组织还不能在上海进行合法公开活动，党中央急需成立一个可以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党的一大召开后不到20天，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便在上海公开挂牌办公，发表宣言，出版机关刊物《劳动周刊》。随后北京、武汉、湖南、广东、济南等分部设立起来。1922年，因书记部机构和驻地几次被查封、相关人员被非法判处徒刑或遭通缉，于是遵照中共中央决定于8月迁往北京，同时取消北京分部、成立上海分部。1923年二七惨案爆发后，北京总部亦被查封，领导人被通缉，3月又迁往上海，此后书记部再设组织大的工人运动。1925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上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书记部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正式撤销。

书记部自成立之日起，党通过这个先进组织和公开机关，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发动和领导罢工斗争，掀起了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在职工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被公认为全国工运的总领导机关，为党成功

领导中国革命、为中国工运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党的建设和工运史上具有开拓性的重要地位。

广泛提高工人觉悟。党做职工运动，起初是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接近群众的。党的一大纲领要求各地区、各行业工人积极创办工人补习学校，以唤醒工人觉悟、启发工人自觉组织工会。书记部及各分部成立后，即投入繁忙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教育工人掌握和运用阶级斗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劳动周刊》（书记部迁京后改为《工人周刊》）和各分部刊物等宣传阵地，北京长辛店、上海小沙渡工厂区等各工人补习学校，纷纷向工人宣传工人阶级团结和组织的重要性，启发工人按产业组织起来。

组织和成立工会。1921年5月，北京的党组织在长辛店领导成立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工会，它与帮会、同乡会不同，是由工人自己组织、为全体工人伸张正义的。在共产党人的积极推动下，到1922年4月，全国各种工会团体已达100多个。书记部特别重视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先后成立了武汉工团联合会、湖南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有的包括一二十个工会，会员约3万人，还有后来成立的全国铁路总工会。

发动、组织和支援罢工。在提高工人觉悟和建立产业工会的基础上，书记部有组织地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本家三重压迫的罢工斗争。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第一怒涛、1923年2月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最后一个怒涛，13个月里全国发生罢工187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最终推动职工运动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新阶段。其中著名的香港海员、安源路矿工人、开滦煤矿工人、京汉铁路工人4次大罢工，都是在书记部支援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书记部迁往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北方铁路做了罢工潮之骨干先锋，便于就近指挥，还能公开开展工作。

发起和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922年5月，书记部发起并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代表173人，代表100余个产业工会27万会员。会议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八小时工作制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等10项决议案，并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总通讯机关，就此确认了书记部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即全国工人运动的总领导机关，已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201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次序，就是起源、延续此次劳动大会的。

亮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那时共产党员多以知识分子组成，对工人入党十分慎重，于是介绍工人入党必先介绍入书记部，书记部成了工人入党的经过机关，提升了党在工人中的分量。书记部在其上海办公场所公开挂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牌子，知情人都知道这是共产党公开的“罢工司令部”。召开第

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书记部凭借较高威信，在会场把“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与“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口号一并布置；大会由一名共产党员主持到底，并临时动议决定书记部为全国工会总通讯机关，会议取得了意外成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挥重要政治影响的起点。

发起劳动立法运动。1922年七八月份，书记部组织全国工会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发布《劳动法案大纲》，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自由。《大纲》共19条，主要是要求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缔结团体契约、国际联合等权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禁止超过法定工作时间，保障工人最低工资和享受劳动保险以及保护女工、童工等。大纲规定，禁止雇佣16岁以下的男女工，禁止18岁以下的男女工担任剧烈、有害卫生及法定工作时间外的劳动，劳动者有权参加政府经济机关、企业机关等，国家设立劳动检查局，各种劳动者享有休1个月年假权，农产品价格由农民提出等。法案深入工人群众心中，变成罢工高潮中斗争的纲领，成为全国工人罢工行动的统一意志。存续3年零9个月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党的事业和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虽然转瞬即逝，但她在中国人民和劳苦大众心中却留下了一座丰碑。

